

当代西方
政治经济学
译丛

[美] 巴里·克拉克 著
Barry Clark

政治经济学

——比较的视点

(第二版)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王 询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译丛

政治经济学

——比较的视点

第2版

[美]巴里·克拉克 著

王 询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惠敏 曹玉志

责任校对：孙 昉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潘泽新

政治经济学
——比较的视点

第2版

[美] 巴里·克拉克 著

王 询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永明装订厂装订

850×1168 32开 17印张 380000字

2001年12月第一版 200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ISBN 7-5058-2626-3/F·2018 定价：29.00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 / (美) 克拉克 (Clark, B.)
著；王询译.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2

(当代政治经济学译丛)

书名原文：Political Economy

ISBN 7-5058-2626-3

I. 政… II. ①克…②王… III. 政治经济学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4907 号

《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译丛

编委会成员(按汉语拼音排序):

崔之元 杜两省 郭庆旺 卢昌崇

孙刚 王绍光 王询

顾问: 汪祥春

编委会还将推出第二套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精典译著系列丛书。

《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译丛：

1. 《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
2.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3. 《货币与金融政治经济学》
4. 《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
衰减的回应》

丛书总序

在当今的中国，对于一般地称做“经济学界”的许多研究者来说，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两大流派，至于两大流派可否交融，甚至可否“交谈”则存在争论。而对于这一领域的教师和学生而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门课程。从这两个方面看，都可以说是“西方”不“政治”，“政治”不“西方”，将“西方”与“政治”同时加诸于“经济学”之前连用，便需要费一些口舌，做一番解释。“西方经济学”自然源于西方。我们所谓“政治经济学”同样是来自西方，不过传入中国较之今天人们所谓“西方经济学”早一些而已。因此，要做解释就需要将眼光投向西方。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初，已经被人们使用了近400年。作为一门学科，政治经济学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发表，迄今也已有200余年。而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为一种职业，则始于19世纪20年代，其时，英国的大学指定了第一批政治经济学教授，也已经有了180年的历史。但自19世纪末以来，“政治经济学”便逐渐为“经济学”一词所取代。以至在很多人眼中，“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这一学科儿时的“乳名”。当

然，从共指同一事物的意义上说，“乳名”与“学名”是同义词，可以混用。将“政治经济学”改称为“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是马歇尔。翻开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开篇可见“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几个字。影响巨大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在1976年的第10版中也写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字样，只是在1985年的第12版中，才将“政治经济学”一词删除。

当萨缪尔森忙于删除其《经济学》一书中的“政治经济学”一词时，在其他一些学者眼中，“政治经济学”一词正再度复兴于西方。不过涵义已不同于其传统用法，而且在不同学者的眼中，其涵义也大不相同。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未放弃过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而且，他们所谓政治经济学也正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西方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乃至西方与西方，中国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对马克思的理解不尽相同。

新兴的“政治经济学”多少与正统的经济学有所不同，它更多地继承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传统。而“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中，尚可区分出有相似性但又有所不同的两种取向。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和弗吉尼亚的一些经济学家挪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来表示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核心的一些研究。这一取向大大地弘扬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传统，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各种政治问题和政治过程。以此类推，另一些学者则侵入了传统上属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领地。将这一取向推向极端，便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统一整个社会科学。这种取向在中国经济学界也已有

所反映。2000年之春，在一次颇有档次的国内经济学研讨会上，一位国内颇为知名的中青年学者便扬言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统一社会科学，他甚至进一步具体地指出，这也就是说，要用博弈论来统一社会科学。且其发言时语言相当犀利，音调颇为铿锵。不禁使人想到历史上粗暴的、野蛮的、法西斯式的试图以武力征服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当然，武器总是不断进步的，吴钩越剑、坚船利炮、飞机坦克、核弹导弹，乃至经济学家手中的博弈论，但无论武器多么先进，是否能够据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则是值得怀疑的。

相对而言，另一取向则较为和缓。一些自称或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过来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在这些学者的眼中，政治经济学是“政治与经济”之学。由此推而广之，则可以分析社会、文化及其他各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或反过来分析经济对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从而，政治经济学便成了一个大“交叉学科”，乃至更宽泛化而成为“社会科学”的同义词。记得一位西方的前辈曾说：“只有一门社会科学，那就是研究社会的科学”（笔者忘记了这位前辈的大名，在这里谨向他老人家致歉）。作为经济学家，无论其如何地和缓，当他或她“进入”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传统领地时，也会携带着自己惯用的兵器，更多地使用经济学的方法。但这些学者较前一类帝国主义者更能尊重其他社会科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甚至有时也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武器。具有这一取向的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和缓得也许不应再称之为“帝国主义者”，而应称之为“大同主义者”。他们主张“和平统一”社会科学。

无论“侵入”，还是“进入”，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者的研

究视野确实是超出了正统经济学的范围，而且正如前面所说，不同的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涵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有不同理解，其内容是极为庞杂的，要将其全面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何况本丛书的策划者和译者们眼界有限，能力有限。本丛书只选译了四部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只能为其读者提供一个管窥的机会，使读者们略见“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之一斑。不过，由于在此之前，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包括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不知道当代西方还有“政治经济学”，因此，即使只是使人们知道有此一物，我们自以为也可以算是有了一点功德。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诸方面确实是相互联系的，而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各方面“耦合”得过于紧密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如此，很多问题不是靠一个学科的分析能够认识和解决的。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引入对于繁荣中国的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而解释、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大有助益的。

尽管有前面的自谦之言，但我们相信，构成本丛书的这四部书（《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货币与金融政治经济学》、《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减的回应》）在当代西方纷纭的政治经济学类书籍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从性质上说，在四部书中，有两部是介于教科书与专著之间的著作，另外两部则属于专著。从所属流派上看，一部是对各大流派的综合论述，两部代表了更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的观点，另外一部则代表了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从所研究的领域看，第一部涉及内容广泛的现代政治经济问题，第二部集中于宏观经济

中政治经济学问题，第三部更具体到货币金融领域，最后一部则是对有关组织的一个特定问题的专门研究。具体一点说，这四部的主要特点和内容如下：

巴里·克拉克的《政治经济学》涉猎领域或问题最为广泛，但也不能涵盖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其作者按照自己的认识，对政治经济学及其与有关学科的关系做了简要的探讨，介绍了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更多篇幅则是从古典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四个主要流派的角度，对政府的作用、通货膨胀和失业、贫困和不平等、文化与性别、教育等范围广泛的各种现代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阿伦·德雷泽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一本专门为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编写的教科书，但该书属于一个新的领域，其风格则介于教科书和专著之间。该书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地分析了隐藏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之后的政治问题，例如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与授权机构、收入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素积累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等问题。

伊藤·诚和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的《货币与金融政治经济学》则是一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我认为，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较多的，也较为深入，选择一部由日本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书来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并非偶然。该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又小于前面两部著作。不过，在当今世界上，货币与金融确实是极为重要的。该书介绍了作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货币与金融理论，分析了货币、信用、银行、资本市场的逻辑

和历史起源、运作原理以及金融不稳定问题，并特别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货币与金融的实践和理论。

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减的回应》一书篇幅较小，既可将其视为一部短篇的著作，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长篇的论文。该书一经出版，便赢得好评如潮，并且，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引用率”。与前面三本书有所不同，书名中没有“政治经济学”字样，但其确实是一部公认的当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该书的书名已明确地指出了书中的内容，此处不需多言。

王询

2000年12月

译者序

在当代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一词歧义繁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大多数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和领域远较现代正统“经济学”宽泛得多。巴里·克拉克在《政治经济学：一种比较的视点》一书中，对这一术语的理解较之一般现代政治经济学家更为宽泛。从思想史的角度上说，作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原始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则是自19世纪下半叶由政治经济学裂变出来的。从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上说，作者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是“一个巨大网络体系的三个方面”，主张综合地加以研究，尤其要综合地研究三个领域中的三种治理结构：市场、政府和共同体。

克拉克对政治经济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做了简要的探讨，特别是对经济学与政治学做了比较。他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区分政治学和经济学：追求的基本目标、追求这一目标的制度性场所、追求这一目标的主要行动者。”据此，作者将经济学定义为个人通过市场追求经济繁荣，而将政治学定义为共同体通过政府追求公正。但是，市场和政府都不能单独地组织社会实现繁荣和公正，而且，“将社会组织起来，实现个

人和社会目标的过程是多方面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只反映了其中的两个方面。要研究这一过程，需要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跨学科视野。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就更需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视野来分析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从视野辽阔、领域宽广的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是“大道”。“大道以多歧亡羊”，政治经济学不仅包容广泛，而且思想观点纷纭。本书则将纷纭的思想观点梳理成四个流派：古典自由主义流派、激进主义流派、保守主义流派和现代自由主义流派。作者介绍了政治经济学以及上述四个流派的发展历史，更多的篇幅则是就政府的作用、通货膨胀和失业、贫困和不平等、文化与性别、教育等范围广泛的各种现代问题考察这四个流派所提出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书中集中了如此之多的观点，似乎有关问题的任何一种观点都已呈现于本书的读者面前，并可以在本书中找到其渊源及其所属流派，以至于使人有“太阳底下无新事”之感。在本书的论述中，条理如此清晰，许多章中的每一节、节中的每一目，甚至在某些目下每一细目的标题都是相同的或者具有相同的句式。以至于大大方便了译者和读者。对译者而言，在翻译过程中，章、节、目的标题中很大一部分中只需“拷贝”即可。而给读者带来的方便之处，相信本书的每一个读者都会深有体会。

克拉克试图纠正经济学过份偏重科学技术的倾向，努力揭示潜藏于政治经济学争论中的价值取向。他认为，尽管“大多数人数声称不喜欢意识形态，将其视为妨碍清醒思考的精神枷锁。但没有人能够摆脱意识形态。”正如琼·罗宾逊所指出的：“每个人都有意识形态、道德和政治观念，自称没有这些观念

能够做到纯客观的人不是自我欺骗就是欺骗他人。”克拉克指出，从根本上说，不同流派有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争论就在于价值取向不同，而公众在对不同政策进行选择之前，需要了解和考虑其暗含的价值取向。而且，这些争论不仅是学术争论，还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不经公众争论，打着科学的旗号将这些价值取向引入政策是违背民主原则的。

王询

2001年元月于大连

导言

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这种发展趋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希望向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将不同人类行为和对社会的研究划为较窄的学科，增进社会科学的分析力和精确性。意识形态也对政治经济学的裂变有一定作用。斯密、穆勒和马克思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展现了社会科学中的冲突和张力。19世纪中叶，作为在政治思想上对自由市场的反应，自由主义流派的地位迅速上升，社会科学家们试图建立一种客观的知识体系用以合理地解释各种社会政策。他们希望运用严密的逻辑和实际资料解决引起冲突的政治问题。

各个新社会科学分支的先驱们认识到了确定其研究领域和分析方法对界定各分支学科的重要性。由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最易观察和定量的行为，作为政治经济学遗产最直系的继承者，经济学在模仿自然科学上最具潜力。人类行为的政治、社会、文化、历史和心理维向托付给了其他学科，而经济

学则集中研究个人在市场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利用个人理性假设及用货币作为衡量原因与结果的尺度，使经济学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仿造19世纪的物理学建立其理论大厦。

现代经济学常常引起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怀疑。批评直指其简单化的人类行为假设，过分关注物质和金钱利益，对社会关系的忽视，及其玄奥的术语、图形和数学公式。与此同时，许多社会科学家无言地表现出了对经济学的欣赏，越来越多地由这一“沉闷的科学”中借用着概念、理论和分析方法。

在经济学家中也存在这类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学自视为“社会科学之王”，将其研究领域扩展到了从政府、法律到家庭、性行为等各种问题。然而，在这种傲慢之下却交织着各种内部分歧。除了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外，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其他广为人们敬重的经济学家也对现代经济学目前的发展方向表示了怀疑。他们指出，过分注重数学和理论上的严谨已使理论偏离了现实或实用目的。目前，经济学家仍然处于一种困境之中，他们的模型越来越精致，现实经济却处于衰退之中，各种社会问题实际上正在恶化。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其他社会科学怎么会去模仿这样一个优缺点共存的学科？

答案在于科学的诱惑。科学的分析在解决学术争论和制定公共政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权重。在社会科学中，人们用以评价学术水平的方式常常与自然科学中的方式相类似，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都没有经济学理论那样严谨和精致。经济学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简单化的假设和研究领域较窄，从而使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

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未能在其各自